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坚定制度自信 走向民族复兴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度自信的重要论述精神，日前，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召开“制度自信与民族复兴”理论研讨会。这是“四个自信与民族复兴”系列研讨活动的第三场。本刊刊发4位与会学者的文章，以增益思考。

历史与人民的必然选择

于凯

从历史视角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自发而成的，而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争取民族独立、探寻国家出路、谋求人民解放与人民幸福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探索、长期实践的结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90多年伟大实践中的长期奋斗和创造，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势力全球扩张与殖民侵略，中华民族被裹挟着卷入了帝国主义列强主导的不平等的“世界体系”，遭遇了“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的内在发展困境与全球因素互为纠缠，带来严峻的挑战与危机。这种变化，内在的规定着中国现代国家的出路选择，要直面双重挑战：既要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中谋求自立自强的地位，又要实现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传统社会转型成为现代化国家。国家制度的再造，成为决定中国国运的基本前提。中国社会各阶级曾就此提出过多种方案，进行了多轮试验，但大多均以失败告终。究其根本，乃是这些主导阶级，受限于自身狭隘的阶级立场与利益取向，不能有效整合广大人民利益，形成有效合力，以化解现代制度构建的双重难题。只有中国共产党人，紧紧依靠和动员广大人民，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与中国人民的共同福祉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科学把握住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历经艰苦奋斗与探索，成功创建并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谋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夯实了前进的路基。

民族复兴的根本制度保障

刘靖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符合我国国情，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精髓和要义，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特点，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坚持把公有制与多种所有制经济结合起来，发挥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优势，为解放和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提供了保障。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基本特征。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公有制经济和其他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协调起来，创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这诸多正义性特征之中，我认为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公”、“平”二字。

所谓“公”，是指中国制度的公共性。人类所有前现代制度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私有性，大多数文明所建立的制度都是由某一部落、民族、宗教、教派、地区、种姓或阶层统治并为其私利服务的。只有中国早在秦汉就建立了原则上代表天下百姓的国家，并且经由举荐到科举，逐渐建立了通过客观标准选择统治者的官僚制度。这一创造，对历史学贡献远比“四大发明”更为重大。从古典到近代，西方文明中出现过的政治制度史与中国蔚为大观的三通六典之类的制度史巨著相比，可谓寒酸鄙仄。此外，只有中国文化产生了“天下为公”这样的政治理想，虽然由于长期存在着皇权、父权和夫权，中国古代制度并未真正成为一个个公共性制度，但是这种理想始终推动着中国制度传统在世俗、理性的轨道上发展。

第二，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资源决定性作用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为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保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具备现代市场经济的全部特征和要素，能够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大生产的要求；同时，这种体制，以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为前提，能够更好地发挥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极大地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开创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时代。

第三，将“先富”与“共富”衔接起来，让“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目标，为激发社会活力和实现公平正义提供了保障。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共富”体现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先富”体现效率，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将“先富”与“共富”有机衔接起来，将“先富”作为“共富”的必要路径，让“先富”激励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创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和“共享”的发展理念，反映了我们党对共同富裕认识的深化，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更高层次迈进。

第四，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开辟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为中国长治久安提供了保障。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也是实现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真实最普遍最高类型的民主。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通过依法治国把党的正确主张、人民的共同意志、国家的科学决策有机结合起来，保证了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的合法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为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统一，为人类政治发展探索出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公共性平等性是最大优势

范勇鹏

无论是纵向比还是横向比，中国当代制度都堪称人类政治制度的优秀结晶。纵向看，中国的制度是在继承两千年传统政治智慧基础上、经过近70年人民共和国和近40年改革开放实践而集大成者；横向看，中国当代制度演进的过程中，从不故步自封，吸收借鉴了各国制度的诸多优点。人类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制度敢称具备了这两条。因而，中国的制度也具有高度的正义性特征，这些特征一直存在。

在这诸多正义性特征之中，我认为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公”、“平”二字。

所谓“公”，是指中国制度的公共性。人类所有前现代制度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私有性，大多数文明所建立的制度都是由某一部落、民族、宗教、教派、地区、种姓或阶层统治并为其私利服务的。只有中国早在秦汉就建立了原则上代表天下百姓的国家，并且经由举荐到科举，逐渐建立了通过客观标准选择统治者的官僚制度。这一创造，对历史学贡献远比“四大发明”更为重大。从古典到近代，西方文明中出现过的政治制度史与中国蔚为大观的三通六典之类的制度史巨著相比，可谓寒酸鄙仄。此外，只有中国文化产生了“天下为公”这样的政治理想，虽然由于长期存在着皇权、父权和夫权，中国古代制度并未真正成为一个个公共性制度，但是这种理想始终推动着中国制度传统在世俗、理性的轨道上发展。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一方面继承了千年的传统精髓，一方面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人民性制度。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原则和能动性一直驱动着这个人民性制度与时俱进，保持着一种运动状态。新中国的制度避免了苏联式的官僚僵化，防止了官僚特权阶层这一“私有”集团的出现和固化，保障了制度的公共性。相反，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就是“世袭式”(patrimonial)制度，美国学者福山近年来也多次论及以“再世袭化”(repatrimonialization)为特征的西方政治衰朽。说白了，西方国家本质上依然是披着民主外衣的封建制度。相比之下，今天中国的制度无疑是世界上最能够保障公共性的制度。

所谓“平”，是指中国制度的平等性。西方人之所以在18世纪末纷纷以平等为革命的口号，恰恰是因为它们在当时最缺乏平等。资产阶级革命所提出的平等无非是用财产的不平等代替了基于血缘的不平等，用资本特权代替了封建贵族特权。西方、特别是美国制度的基本特征是自由。自由听起来很美，却天生是平等的反对派。基于自由的制度必然演变成少数人的盛宴和多数人的灾难。近年来，西方学术界有不少人开始关注长期被掩盖的平等问题，甚至已经有学者指出西方制度未来可能的崩溃就是由于不平等。

中国在大型古代文明中唯一一个建立了平等的身份。秦末农民起义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口号，直到18世纪欧洲人的脑子里都不会产生这样的念头。中国人创造的以知识为客观选择统治者标准的制度令知识的每一次扩散(如造纸术和活字印刷)都带来了平等的大进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国，根本性取消了各民族、各阶级的不平等。新中国的国家制度最大的特征就是使人向着平等的方向发展。平等意味着实质的民主，意味着社会的流动，意味着根本性的正义。

公共性和平等性是中国制度最大的优势，但维护和发展这种公共性和平等性也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挑战。过去经济发展和改革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特权、腐败和不平等现象需要大力治理。中国制度的优势并非注定的天然优势，它们既是前人智慧和努力的结晶，也需要当代共产党人坚决保卫、努力发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垂范制度榜样。

为文明进步提供中国方案

赵庆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给全体中国人民带来了福祉，而且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

彰显自主选择社会制度的必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继承了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基本诉求，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顺应了全球化时代改革创新的时代潮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始终坚持立足中国国情，独立自主地进行设计与完善，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革与发展；既坚持立足本国制度实践的特色与优势，又注意对世界各国制度优点的吸收与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打破了近代以来西方对现代化模式的垄断，不仅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一种崭新的形式得以延续和发展，而且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选择发展道路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启示世界，各国一定要根据历史和现实，兼顾时代前进的趋势与方向，探索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社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全可以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充分竞争，并日益展现出其特有的优势与活力。

凸显中国繁荣稳定的世界贡献。经过新中国成立后60多年的艰难探索，尤其是改革开放近40年的积极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不仅保障了中

国的整体发展和全面进步，也实现了在世界舞台上的和平崛起与文明复兴。目前，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迈向全面小康，逐步从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从全球视角来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大贸易国和外汇储备国，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达6.7%，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创造了经济社会落后国家的发展奇迹。中国保持自身平稳健康发展，不断迈进和平崛起与文明复兴，持续提高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和共同繁荣的能力，这本身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探索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法。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不少国家难以摆脱政治失序、经济失调和失控的沉疴痼疾，或者出现社会失范、体制失灵和管理失职的治理难题，亟待以良言良策求良法善治。在此背景之下，许多国家将目光投向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发展的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注重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彼此协调，加强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形成了治国理政的基本策略与有效方法，不但保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行稳致远，也为各国实现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启示。

蕴含制度文明所追求的共同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对改革开放成功实践的总结，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探索的制度成果，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中国智慧，也反映了人类文明制度共同的价值理念。在制度选择上要实事求是的精神，真正做到“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因地制宜，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在制度设计上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构建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各项权益的制度体系，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制度发展上要坚持开放包容的理念，汲取各国制度创新的成果，完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先进的社会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蕴含的共同价值，为其他国家选择和构建社会制度提供了借鉴。

总之，中国发生的巨大进步雄辩地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了明显的制度优势和强大的自我完善能力，不仅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也有信心为人类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学者笔谈

认真对待生态安全问题

肖巍

所谓安全问题，即某种情况已具备足够危险的性质，如果不加以解决，将可能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而作为国家安全体系要素的生态安全，也扩展了传统安全观的内涵。生态安全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长久稳定，既是支撑国家生存与发展不受威胁的生态系统，也是国家应对内外重大生态问题的综合能力。

生态安全已成为焦点问题

“生态安全”的意思是生态环境已不安全而成为安全问题，这也是若干年来日益引起关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愈来愈成为世界各国安全事务的重要内容。一是国家安全必须有稳定的生态环境支撑。当一个地方的水、空气、土地、生物等环境要素遭到严重破坏，维持生命系统的自然功能严重衰退，导致自然灾害频发，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急剧下降，甚至丧失了安身立命的生态依靠，这个国家就出现了生态安全危机，进而引发社会恐慌和冲突，激化各种矛盾乃至国际冲突，转化为传统安全问题。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一些地方的环境恶化已经成为地区局势动荡和国家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而且一旦有民族、种族问题牵扯进来，生态安全就会迅速政治化，变得相当复杂和敏感，显然这样的社会不可能有安全感。二是社会安全必须克服生产贫困的环境危机。生态安全与贫困状况往往有密切关系，贫困使穷人更容易遭受环境恶化的危害，因为无可选择，穷人又不得不主要依赖自然资源为生并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因此，贫困往往与生态退化相伴。人们为生计所迫，不会考虑自己行为的生态后果。贫穷、人口压力和环境恶化也正在成为现代动乱甚至战事的一个温床。目前地球上60%的生命支持系统面临着威胁，生态退化和资源短缺所产生的经济压力，很可能转化为社会不安与政治动荡。三是国际安全必须营造和平发展的环境条件。如果全球生态系统得不到有效保护和明显改善，生态安全将进一步危及世界安全。环境压力既是政治紧张和武装冲突的起因，也是它们的结果。国家之间为争夺资源控制权发生的冲突，与各种传统冲突交织在一起，进一步扩大并加剧了冲突。由于生态退化，国际合作的经济基础、政治意愿和社会支持条件都会发生异变。特别是近年来，全球数以亿计的环境难民离乡背井，处境艰难，严重加深了地区不稳定，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不安定因素和非常棘手的安全问题。

生态安全的利益协调

生态安全问题实际上是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表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利益是道德的基础，安全的道义要求就是通过规范人的行为对利益进行再分配。各群体之间的环境利益关系往往表现为社会的和谐状况，国家之间的环境博弈也是各国发展与环境权益的较量以达成某种均衡。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生态安全都要寻求建立一个比较公正、有效的环境利益协调机制。

生态安全还改变了什么

根据传统的国家主权观，主权是对外独立权和对内统治权的结合，具有不可侵犯、不可分割转让和排他性。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有权平等参与生态环境领域的国际事务，对于本国生态环境问题拥有国内处置权和国际自主性。主权国家对境内环境和资源的利用是国家的内部事务和主权象征，国际社会不应干涉。但是，全球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它并不受限于主权国家，生态失衡、环境污染往往跨越了国界，许多跨界环境问题又互为因果、相互影响，逐渐扩大。这些特征表明，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能够“自行”解决自己引发的或外部带来的环境问题。这就要求环境治理的跨国联合行动和国际合作，包括传统意义上属于国家主权的某些内部事务因此也要受制于国际条约，国家主权在一定范围内受到了限制，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全球生态安全，进一步构成了国家利益新定义的主要依据。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构建，贯穿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三大历史阶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前赴后继、不懈寻找国家自主进步的探索过程，也是一个层层递进的连续的能动构建过程：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反帝、反封建、反官僚权贵资本的任务，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政治制度，实现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合一，明确了人民为主体的内在政治规定性及权力合法性，体现了人民主权为主导的政治解放逻辑。第二，社会主义改造与早期建设，以国家工业化为目标，动员激发全国人民主体意识，通过集体化、合作化途径，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建成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有效化解了自发经济的两极分化趋势，体现了发展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诉求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发展逻辑。第三，改革开放以来，在坚持人民民主根本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以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为重点，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体制、社会治理体制与法治体制，体现了社会主义方向与改革开放视野相统一的体制改革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构建，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体理性的胜利，是历史与人民的必然选择，体现了中国道路构建中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内在统一性。这一制度的确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历史走向与内在进程，极大地影响了全球历史总体进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作者为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